

最近,有两篇访谈颇耐人寻味。一次是对导演张艺谋关于电影《金陵十三钗》的访谈,另一次是对作家格非的访谈。两者有一个相通之处,无论是导演还是作家,都强调了文学叙事“讲故事”的重要意义。

在对张艺谋的访谈中,张艺谋认为“想表现人性的光辉,讲好故事是永远的功课”,而所谓好的作品就是“思想性、文学性、可读性三性统一”。一直以来,学界对张艺谋的诟病,是其过于突出电影的视觉化效果,刻意追求电影宏大场面的刺激,文本的叙事性不足。对于这一点,张艺谋似乎是有苦难言。2010年《人民日报》曾对其有过一次专访,他在《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中说“对今天的电影来说,故事是最重要的,故事包含着万物。因为今天的观众观影经验丰富,花拳绣腿诱惑不了他们。故事和人物如果不好,最终会失败”。他认为,尽管自己非常重视文本的重要性还一直受到批评,是因为好的剧本太难产生,而自己是“等米下锅”。而作家格非的创作从《褐色鸟群》到《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以及《春尽江南》,这其中很明显的一条线索,就是格非从刻意的突出叙事技巧开始逐渐的开始重视作品的故事性。格非认为:“我所理解的故事是一种隐喻,这就涉及到我们写小说的为什么要写故事,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小说的特质当然就是故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两则访谈似乎传递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文艺创作开始重新重视文本叙事中的“故事性”了。

其实,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是一直重视文学“故事性”叙述的。鲁迅说:“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需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谈到,中国古代的文学大抵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登上大雅之堂的诗歌和散文。这一类是“庙堂文学”,在传统文化意义上属于文人创作的文学,是真正的文学;另一类则“差不

# “故事”叙述与文学性的回归

□张鸿声 吴鹏

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而“俗文学”的特质,在于它是大众口头相传的,其间,其叙述的故事性功不可没。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郑振铎接下来的描述。他说:“因为正统的文学的范围很狭小——只限于诗和散文。——所以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的篇页,便不能不被目为‘俗文学’,被目为‘小道’的‘俗文学’占领”。并且很多正统文学的文体“原都是由‘俗文学’升格而来的”。郑振铎的论述,由于受制于时代环境的影响,可能会有偏颇之处,但是有一点却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故事性”在中国古代文学叙事传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晚清以来,由于整体社会环境的变化,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造成以小说和戏剧为代表的俗文学地位的提高。从改良到革命,知识分子们意识到需要广泛的群众基础,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倡导“改良群治、新民”,严复在《原强》中则说“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这种启蒙的重任。梁启超的“改良群治”和“新民”是要从“新”小说开始的。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由于启蒙对象主要是针对文化水平相对偏低的普通百姓,为了迎合他们的需求,引起他们的兴趣,文学创作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文言文

向白话文创作的转变,创作文体更重视叙述的“故事性”,小说、戏剧等俗文学开始登上大雅之堂,承担起民族启蒙的重任。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创作,重视文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1917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强调要创作平民文学,写实文学,通俗的社会文学,而陈独秀所要求的这种文学创作是无法而且也必须要重视文学的故事性的。而后的左翼文学、延安文学以及解放后从延安文学延续到全国的文学创作,基本都遵循了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大部分都是以普通大众作为创作的接受者,一定时期内甚至只能创作和普通大众相关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而其他创作手法都被作为可能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创作倾向受到批判,文学的“故事性”叙述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20世纪后半叶,是文学“故事性”叙述边缘化的一个时期,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反对文学的工具化。“俗文学”从“小道”开始延续到近代登上文学创作的大雅之堂,一直到20世纪成为社会改革、文化启蒙等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其地位的逐渐提升都是和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相联系的。钱理群等学者认为“从《新青年》鼓动‘文学革命’开始,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就主张文学服务于思想启蒙,注重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谈到自己创作的时候也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文学开始服从于“救亡”这一主题,强调文学的功利宣传性,强调“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而这种文学创作一方面适应了时代的大环境,同时也是以丧失文学的多样化、文学的自主化为代价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新中国建立以后,延安讲话的精神走向全国,成为唯一合法和正确的文学创作方向,《讲话》关于文学是“齿轮和螺丝钉”的表述在“文革”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更是达到极致。“文革”以后,学界开始清理一系列不正常的文学创作方式,而这种清理却同样是在政治话语体系下完成的,也是文学工具化的另一种表述方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于对文学太多干预社会生活的强调,要求文学回到自身,导致了文学创作中另一创作倾向的产生,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锋文学、现代派文学等的创作。这一创作潮流在反对文学社会功能,反对文学作品的工具特性的时候,也同时把文学重视叙事性的传统丢失了。文学叙事性的边缘化还有另一个影响,这是世界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大都市的兴起,原来的创作方法已经不足以把握和书写当时的时代。从英国的象征诗歌、现代派创作思潮到国内的新感觉派等创作,都力图用一种新的方式把握时代的变化,用一种新的文学书写方式表达内心的感受,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创作环境已

经逐步放开,西方一系列的文艺理论进入中国,同时由于周围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的用不同的理论方式进行创作。而这种倾向也是文学“故事性”叙述逐渐边缘化的又一原因。

这就产生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对于创作技巧和创作手法的追求是为了回归文学自身,为的是对抗文学的社会功能,祛除文学工具化的特征,而文学叙事性的边缘化却是这一愿望的不自然结果。文学作品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是“故事性”和诗性的统一,实验和运用不同的形式是为了把作品内容表述的更加生动、活泼,表述的内容更加丰富和贴切。不过,对作品形式、文学技巧的刻意追求却丢失了文学的某些基本特性。曹文轩在《小说门》中说:“小说离不开故事,而只要有故事,就一定会有小说。小说是那些杰出的叙事家在对故事有了深刻领悟之后的大胆而奇特的改写。故事随时都可能被一个强有力的故事家演变成为小说。故事与小说的这种关系是无法解除的,是一种生死之恋。”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前几年,电影界存在一个普遍的倾向就是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大量使用拍摄技巧,一味追求场面、镜头的宏大感,这在最开始的电影上映中受到了观众的追捧。但是,当电影的大场面、炫耀拍摄技术成为一种习惯之后,人们开始产生审美疲劳。“大片”纷纷落马,票房一落千丈。与之相对应的是今年上映的一部小成本电影《钢的琴》,这部电影拍摄的场地是老东北的废旧钢厂,没有庞大的演员阵容,没有豪华的后期制作,只是讲述了一个普通的下岗工人父亲要为女儿制作一架钢琴的故事。然而,就是这部电影却屡获大奖,也是2011年仅有几部不但没有责骂、反而好评连连的电影之一。可以说,叙事性以及叙事中的“故事性”的被强调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文学性回归的一种表现。

理论观察

## 文学呼唤崇高

□王雅平

因为自然、人生、社会均以崇高、伟大作为存在的主体,所以崇高美、雄壮美也成为人类文学、艺术审美的主导方面。在中国文学的汪洋大海中,自远古神话传说、《诗经》起,到屈原的《离骚》、李白的诗歌、

文天祥的《正气歌》,从明清小说到茅盾的《子夜》、郭沫若的历史剧,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红色经典作品,如《红旗谱》《林海雪原》《红日》以及当下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闯关东》《大宅门》,以及何建明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品,如《部长与国家》《国家行动》《根本利益》等,都充满了强烈的阳刚之气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给人以鼓舞和力量,即使有眼泪,其眼泪也是有硬度的。就世界文学而言,荷马史诗、《神曲》,雨果、托尔斯泰、海明威的作品等,都是浩大的英雄颂歌。我国向来崇尚力量、意志、节操、德行,要求文学美走向德化性和人格化。西方文化对崇高美更强调,对崇高美的研究更系统、更具体。古罗马朗加纳斯发凡提出“崇高”之说后,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美国经验主义美学家博克、狄德罗等都曾从不同角度探讨过崇高品质,康德是研究崇高的集大成者,将崇高的范围扩大到艺术领域。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批判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美学理论的基础上,也指出崇高不仅包括于自然中,而且也包括在社会现象和艺术现象中,特别是存在于人及其生活中。李斯托威尔认为:“崇高存在于精神上或物质上令人震撼的宏伟里面,它是确定的,而不是捉摸不定的。它包括我们赋之以崇高感的外界事物的庄严宏伟,也包括灵魂的高尚伟大。没有灵魂的高尚伟大,最高贵的艺术作品和自然都必定永远黯淡无光。”诺贝尔文学奖正是以作品是否具有“观念和生活哲学的真正崇高”,是否体现着“高尚的、健全的理想主义旨趣”,是否能“让人性比从前更好、更高尚”为其评选标准。凡此种种,因其浩荡澎湃、励志向上的特征,崇高美应该成为我们当代文学以及当代其他艺术形式最主要的审美规范之一。

这些年来,在班驳陆离的各种文学思潮的变迁中,文坛颓废之风极一时之盛,苍白、空无、内欲、死亡、穿越,逃避现实,难以理喻的混沌圈套,一些作家屡从病态的或变态的人类情感中寻求所谓创作灵感,等等。当代文坛颓废之风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社会转型期矛盾的层出不穷,高压生活下烦躁、焦虑心理的发泄,资本时代片面追求金钱与名利等。泥沙俱下的文坛有待净化,而文坛的净化,有待健康向上的崇高美的有力反拨。

实现崇高美,首先取决于作家认知客观世界的高度。“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宋·范宽),“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柳公权),中国文学创造美学一再强调君子应“进德修业”,“修辞立其诚”,也就是说,胸存崇高,诚立于中,写灾难、残暴、痴疾、孱弱也能表现创作主体的积极崇高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反之,自灰暗、心存卑俗,即使雄伟阔大、光

明美好,也会流于肤浅、苍白。所以作家只有与客观世界律吕谐和,修炼成“充实而有光辉是谓大”的崇高人格美,才有可能成就崇高的诗篇。

其次,悲剧感是崇高感的特殊形式。它是正面的英雄性格的人物在具有必然性的社会矛盾剧烈冲突中,遭到不应当有的,但又是必然性的失败、死亡或痛苦,从而引起人们悲痛、同情、奋发的一种审美特性。它是由社会生活中悲剧性矛盾冲突和悲剧性性格所构成,这种悲不同于自然生活中的悲,它必须本质上与峻拔、雄壮、阔大的崇高一样令人振奋,使人奋起,提高精神境界,产生审美愉悦。埃斯库勒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的普罗米修斯不畏强权,盗天火给人间,是为人类正义事业献身的高大的英雄形象,被马克思誉为“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至今仍给人以精神力量。正如朱光潜所说:“它唤起不同寻常的生命力来应付不同寻常的情境。它使我们有力量去完成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希望可以完成的艰巨任务。”因而写悲剧也是实现崇高感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崇高美呼喚诗性文学巨著的诞生。应该说诗性文学巨著是崇高美的最集中代表,它融民族精神、民族历史、民族文化为一体,可以全景式地反映时代与社会的本质;融叙述性、描写性、抒情性以及戏剧性等多种表达和表现技巧于一体,尽量释放在对民族和国家的思考中喷发出来的思辨力量和感情力量,它的震撼作用、认识价值和审美意义是极其巨大的。新时期及新世纪以来,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真正庄严、雄浑、正大、令人振奋、鼓舞的作品仍然严重缺失,因此,对文学崇高美的呼唤,也就是对诗性文学巨著的呼唤。诗性文学巨著的诞生不是没有可能的。20世纪百年历程里,中华民族经历的灾难、痛苦、悲壮,反抗列强的斗争,尤其是抗日战争的流血牺牲已经沉淀为厚重的历史,而今中国人民又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在开创一个新的伟大世纪,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经过长期血与火的洗礼,形成了建立在科学世界观基础上的坚韧不拔、英勇不屈、宽阔博大的精神,我们有责任以这种精神去创造诗性巨著,去创造文学的崇高美,“对于刚刚用自己的血和泪写出了人类史中最有奇特一页的这一代人,必须给予更高的东西”。

书评

## 悲智双运的现象学透视

□吴晓红

苏文清的文学批评专著《“80后”写作的多维透视》透视了“80后”写作的文学和文化存在自身,把“80后”写作作为一面镜子,对中国当代的青少年文学进行多维度的反思,为困境中的主流儿童文学提供帮助。该著从文化属性、文学史生态、儿童文学创新三个角度透视“80后”写作,力图更深入更具体的阐释作为一个复杂的组合体的“80后”写作的文化和文学特性。该著在一个宏大的背景下展开,所涉文化与文学理论十分丰富,所涉文学现象视野十分开阔,却不失内在的严谨。

该著上卷部分论述“‘80后’写作与青年亚文化”。从文化到亚文化到青年亚文化到“80后”写作的青年亚文化诉求,由远到近,由理论到现象,清晰透视了“80后”写作的文化内涵,其中有关文化的阶级与意识形态属性的理论阐述,有机呼应了“80后”写作的现实成因与文化诉求的现象分析,凸显出“80后”写作抵抗与妥协共存的文化存在本相。

该著中卷部分论述“‘80后’写作与主流当代文学”。作者成功运用文学生态学的观念与方法,对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80后”写作的文学生态作了准确界定——“五四文学革命开创了本世纪文学顶级生态景观”;十七年文学到十年“文革”,文学逐渐衰弱到形成文学荒漠;“‘80后’写作处于由文学荒漠到顶级生态景观恢复的过程之中”。可以说,作者对有关演变过程的描述相当生动甚至激情飞扬——“对本来可以成为财富的丰富的积累这样层层单一化的选择,是对文学的一次次肢解,是对文学生长境域的一次次窄化,是文学生态环境的一次次缩小、换言之,当代文学一出生就被迫偏食。”“变、变、变,时代在变,环境在变,创作也得跟着变。在不断的调整、适应中,还果真形成了一些具有当代文学特质的东西……从正面说,它们是时代规范与作家创作的共鸣,从反面说,它们是作家们前赴后继地雷辟牺牲而蹚出的一条生路。无数作家倒下了,连同他们一起倒下的是他们对文学多样化的热情而谨慎的探索。”于是,水到渠成,作者回顾历史所得的启示令人产生深切共鸣——“‘80后’与大师们处于不同的生态位,他们赶上了一个宽松的写作时代……有这么多的青少年喜欢写作毕竟是好事,他们的写作也是文学写作多元化的一种实践。”在颇具气势的宏观扫视“80后”写作的文学史生态位之后,作者又细致周密的微观审视“80后”写作对主流文学的渊源承继关系。首先,新写实主义缺乏理想、远离高新的创作态势,对“80后”写作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因为“对于‘80后’而言,他们不理解政治大革命结束后乌托邦理想的衰微,却享受着世俗

欲望的满足。他们能理解的是,新写实以创作实践和理论向他们传递的如下信息:文学可以放弃终极理想的说言,可以表现人的世俗欲望,可以不回避卑污、鄙陋、晦暗的场面,还可以冷眼看世界”。作者重点分析了池莉的叛逆少年形象塑造。认为池莉以她的“新眼睛”叙写孩子们的生活,解构了关于乖孩子的神话,完成了对孩子世界的重新叙述与注解,填补了当代文学在孩子叙述领域里的一项空白,其逆意、叛逆少年形象的塑造,成为“80后”写作叙写边缘少年生活的直接资源。此外,作者认为,“80后”很多写手都对先锋文学情有独钟,他们继承先锋文学在形式上的探索,“运用富有震撼力的语言”,“无情暴露生活中成人的缺陷及成人话语的虚假性”,从而完成精神上的反叛。中卷部分的有关论据雄辩有力,给予“80后”写作的文学存在以公正合理的评价,为悬置在文坛和市场之间的“80后写作”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史位置。

因童真不再的《三重门》而令文坛惊奇的少年作家韩寒,如今已经为人夫为人父了,因虚幻空灵的《幻城》而令文坛惊艳的少年作家郭敬明也已成为文化产业市场的大老板——“80后”写作本属于青少年自己创作的成长小说,随着“80后”作家们的长大成人,作为一种现象的“80后”创作正在而且必将成为历史。如果说青少年文学是广义的儿童文学在内涵和外延上的拓展,那么,作为历史的“80后”写作就是一面镜子,它的走红反映着主流儿童文学的寂寞,它的兴盛反照出主流儿童文学关于青少年时期生活创作的缺失。如何让儿童喜爱儿童文学?如何让儿童文学回报儿童文学作家?如何让主流文学主导市场?该著下卷“‘80后’写作与成长文学”对当代主流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理论进行了梳理,特别论述了成长小说独特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以“80后”写作作参照,以董宏猷的小说、徐鲁的诗歌为范例,作者在肯定主流青少年文学的启蒙立场与形而上的思考的同时,以批评的眼光暴露了主流成长文学的题材局限及远离青少年当下的生活的不足。该著最后以风行世界的《哈利·波特》为范例,以胡塞尔的主体间性哲学为指导,总结儿童文学创作的三点启示:“1.成人和儿童只有进入生命体验的层次才能实现互识与共识。仅仅止于儿童的眼睛看、用儿童的耳朵听是不够的。2.当代童话创作如果打破体裁边界,吸纳小说技法,就可以拉近和时代的距离,扩大接受群体,增强童话的生命力。3.童话需要启蒙,但不要太功利、太直接、太单一。童话首先必须保证自身的丰富性和整体性才能有其他的可能性。”至此,作者提出了那将要被思考的——慈悲而又智慧,悲智双运,该著的现象学透视得以完善。

洞察

广告

长篇小说 六人晚餐 鲁敏

散文 文化的非洲 云杉 边地所城 熊育群

特选·刘慈欣科幻小说

微纪元

诗云

梦之海

赡养上帝

诗歌

老虎,老虎 刘立云

风在吹 杨森君

阅读大海 刘海星

诗二首 王金生

二〇一二年第二期 总第六百一十二期 目录

人 民 文 学

## 钟山

《钟山》(双月刊) 邮发代号28—3 全年90.00元

《钟山》长篇小说(半年刊) 邮发代号28—310 全年40.00元

《钟山》双月刊 2012第二期目录

长篇散文  
中篇小说

南溪水 范培松  
无鼠之家 陈应松  
尘埃 章泥  
我不是精神病人 刘仁前  
闺中密友 樊理  
微笑 王大进  
在天上 吴文君

诗与诗人  
非虚构文本  
钟山记忆  
江南风流

李成近作选  
诗十首 邹晓慧  
“中国境内用兵,由北而南者无不胜” 王彬彬  
史可法:抛骨竟无家 李洁非  
最后的生命之花 诸荣会

我刊电子版,常年接受征订,欲了解详情,请登陆《钟山》网站:www.zhongshanzazhi.com

《钟山》双月刊合订典藏本

应一些读者朋友的要求,编辑部分别精装了部分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钟山》(双月刊)合订典藏本,并邀请方方、叶兆言、毕飞宇、陈应松、苏童、范小青、赵本夫、黄蓓佳等众多著名作家联合签名。一年一册,定价相同,每册88.00元(含邮资)。数量有限,售完为止。

欢迎 邮购

款寄:210019南京梦都大街50号《钟山》杂志社毛全星女士收,免邮资。务必写清您的姓名、邮编、通讯地址和邮购内容。联系电话:025-86486038。

当代文坛